

《全辽金文》校订

薛瑞兆

摘要: 本文从小传撰写、作品辑佚、文字校勘等方面,试校订《全辽金文》“金文”部分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校订; 全辽金文; 古籍整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 K2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8)04-0033-06

阎凤梧等编纂的《全辽金文》,包括“全辽文”与“全金文”两部分。其中,“全金文”是以清人张金吾《金文最》为基础,自谓增收作者102人、文948篇^①。特别是在山西全境征集石刻资料,有所发现。然而,由于对《金文最》缺乏研究,未能厘清其中得失,也就谈不上批判地继承。如混入非金人作品、不辨假冒诏疏、撰者失名可考而未考、撰者署名有误而未考、版本选择不精等等,则悉数采纳。因篇幅有限,这里仅讨论新编金文的问题。

小传考证屡见疏失

编纂一代文章总集,必然涉及作者生平履历问题。只有深入研究作者、作品及当时典章制度,才能比较准确地立传,减少谬误。可以说,古籍整理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更多的在于“文章”之外。在这方面,《全辽金文》距离远甚。

一是拼凑混乱。如施宜生(1091—1163)(中册1108页。下省“册”“页”二字),所据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25《三史质疑》:

正隆四年冬,偕移刺辟离刺使宋。宜生自陈:“昔逃难脱死江表,义难复往”。力辞,不许。盖是时海陵谋伐宋,故以宜生往使,以系南士之心,与用蔡松年为相之意同。宜生既归,以辟离刺至宋不逊,不即以闻,被杖。五年,除翰林学士。次年,中风疾。大定二年,致仕。三年六月卒,年七十三。

①《全辽金文》凡例,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以下引用,省略为X册X页。

收稿日期:2008-04-20

作者简介:薛瑞兆(1947—),文学博士,黑龙江大学文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献出处注为“《金史》本传”。而《金史》本传所载与之南辕北辙:

四年冬,为宋国欢旦使。宜生自以得罪北走,耻见宋人,力辞,不许。宋命张焘馆之都亭,因间以首丘风之。宜生顾其介不在旁,为庾语曰:“今日北风甚劲”。又取几砚间笔扣之曰:“笔来,笔来”。于是宋始警。其副使耶律辟离刺使还以闻,坐是烹死。

施宜生传因背离事实而成为《金史》的严重舛误之一。两朝文章总集的结论与出处如此不符,也成为其中的严重舛误之一。

再如李纯甫(下2615)生卒年标为(1177-1223),即大定十七年至元光二年,当是参考了周惠泉先生的研究成果^②,而内容仍沿袭《金史》卷126《文艺传》的谬误:“正大七年(1230),坐取人逾新格,出倅坊州。未赴,改京兆府判官卒于汴”。所谓正大七年,使问题复杂了,前后矛盾,令人不知所从。

再如雷渊小传(下2760),作至宁元年词赋进士,钞自“《金史》本传”。今按,卫绍王即位后历年号三:“大安”、“崇庆”、“至宁”。崇庆二年五月,改元至宁。其年八月,胡沙虎弑君,迎升王登位,是为宣宗,旋于九月更为贞祐。而该年“二月,放进士榜”^③,则是崇庆癸酉科。《金史》屡见“至宁进士”,《全辽金文》亦未能免。

② 周惠泉《金代文学发凡》考证李纯甫卒于元光二年,颇是。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52页。今补充一例,清施国祁《归潜志跋》云:“至太宗神射之为太祖神功、李纯甫卒于元光末、王仲元为王广道从子,良由神川误记,不必校”。也就是说,尚有旧抄本《归潜志》作“卒于元光末”,应是神川原本记载。至于正大七年云云,良由传抄致误。见崔文印点校《归潜志》附录,中华书局,1983年,第193页。

③ 《金史》卷23《五行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541页。

再如刘祁小传(下3646):“祖刘沂,游宦南京”。今按,元王恽《秋涧集》卷58《浑源刘氏世德碑铭》谓:祖刘似,字稚章,号龙山,浑源人。四处廷试,用恩赐第,授承仕郎、华州教授,转承直郎、沂水主簿,卒年五十五云。或许是出于为读者提供更多信息的良好用心,却把话说远了,造成擅改刘家祖名、编造履历的效果。

二是无考作者过多。如完颜兀室(中958),即希尹,本名谷神,大金开国元勋之一,《金史》有传,而《全辽金文》不知何许人。他如张汝为(中1469)、王堪(中1483)、姚孝锡(中1569)、赵摅(中1633)、范圆曦(中1668)、耶律履(中1723)、杨伯仁(中1766)、冯翼(中1870)、吕卿云(中2073)、高有邻(中2083)、李大方(下册2714)、王仲元(下册2734)、吕子羽(下册2640)、舒穆鲁世勣(即石抹世勣,下册2740)、袁从义(下册3582)、孟攀鳞(下册3623)、赵思文(下册3728)、高怀贞(下册3736)、李世弼(下册3757)、张弥学(下册3786)、田特秀(下册3779)等等,《金史》、《元史》及金元集部俱有传记、墓志,且多收入《全辽金文》,竟置之无考。这些问题反映出编者对金代文献的熟悉程度及从事古籍整理的基础。

另,一些作者见于《全辽金文》所收文章,虽只言片语,亦有资考证。如尹莘(中1704),小传无考。

今按,姜国器《章邱县重修宣圣庙碑》(中1672)云:“大定岁次癸巳秋八月,从祀尹公莘致君,以进士登乙科,来贰此邑”;“予与公为乡人,又同笔砚间,见闻其事为详。”姜国器,石州定胡人。如上可补:尹莘字致君,石州定胡人,大定十三年进士,释褐章丘县丞。

另,一些作者在《金史》及其它文献略有涉及,汇聚点滴,亦可见其大概。如韩希甫(中1732),小传仅三字“钜野人”。今按,《金史》卷125《文艺传》有云:河内“县民为之谚曰:‘西山至河岸,县官两人半’。盖以前政韩希甫与(王)竞相继治县,皆有干能,絳州正平令张元亦有治绩而差不及,故云然。”又据李栗《京兆府重修府学碑》(中1470),海陵时,韩希甫尝同知京兆府尹。

另,一些作者在方志中有传记资料,亦应斟酌采信。如乐著(下3777),小传亦三字“安阳人”。其《商王河亶甲庙碑》自称“相人”,有“同年张敏修忠傑”语。今按,张敏修,大安元年进士。则乐著亦同年及第。《(嘉靖)彰德府志》卷七《选举志》云:“乐著字仲和,永和人。为荆王府文学,博学多

识,能为赋。北渡居聊城。”相州,乃彰德古名,永和隶之。

另,一些作者见诸碑石,或撰文,或书丹,或篆额,署名多具乡贯、自号、官衔,都是难得的资料。如李嗣周(中2058),小传无考。今按,《(同治)畿辅通志》卷152《金石》著录其《转运使焦公墓铭》,署“范阳李嗣周”撰;大定二十五年,为《范阳夫子庙》书丹,署“西溪子李嗣周”;泰和六年,为《洪崖山寿阳院记》篆额,署“奉训大夫前河间府河间令兼管勾常平仓事龙骑尉赐绯鱼袋致仕李嗣周”^①。

总之,可考而未考,该补而未补,几乎所在皆有。从中引发的教训是,搞古籍整理尤其需要沉下心,长期坐住板凳,一点点收集资料,一个个攻克问题,即便如此,由于功力所限,也难免不出错误,更何况心态浮躁?

三是小传涉及的地名,或避而无释,或望文生义。如“南唐”何若愚(上1424),小传无释。今按,清董涛《阳曲金石录》收金人《南唐令耶律某等黄山题名》,按曰:“《金史·地理志》无南唐县。南行唐,俗每省作南唐县”^②。南行唐,即行唐,辽时属檀州,金时隶真定。民国陈汉章《辽史索隐》曰:“汉、晋志本作南行唐,《魏志》去‘南’字。故城在今行唐县北,魏移今治。”^③

再如“筠溪”宁师常(中1652),小传无释。今按,秦岭之终南山有筠溪,在今陕西周至境内。王嘉由此创立全真教派而演为道家圣地。金末元初赵著《奉送和甫李公提点还终南筠溪》云:“筠溪道士眼中人,诗卷常随放浪身”^④。

再如“大鹵”杨威(下3703),小传无释。今按,《春秋左传集解》第20:昭公元年,“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鹵”。注引《穀梁传》:“中国曰大原,夷狄曰大鹵。”杨氏先世籍贯太原,书之以示不忘根本。金人撰作文章,屡见如此。

再如“蒙泉”刘渭(下3616),小传无释。今按,所谓蒙泉,即蒙溪,在陕西长安御宿川东南山。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9《胜游》有云:“泉北流五福山,南遮洞口,若画屏,取《易·山水蒙》卦,

① 陈垣《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055页。
② 《石刻史料新编》第3辑2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1986年,第463页。
③ 张修桂、赖青寿《辽史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4页。
④ 刘兆鹤、王西平《重阳宫道教碑石》,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12页。

号曰蒙溪。”署名冠以蒙泉，当是长安人。

再如“鉴山”方亨（下 3621），小传无释。今按，明李贤《大明一统志》卷 32 有云：陕西耀州城东有鉴山，“年丰则山中有光如鉴”。署名冠以鉴山，当是耀州人。

这些地名均与作者籍贯有关，或读书不到，不得不回避。而望文生义，以其有悖学术研究的本质，往往造成谬误。如“古丰”姚孝锡（中 1569），释曰：“今河北丰润”。所谓古丰，亦称安丰，即丰县，隶徐州。其《忻州庙学碑》即署“徐州姚孝锡撰”^①。

再如“大梁”张守愚（中 1976），释曰：“今河南开封人”。大梁，战国魏之都城，后人以此称开封，聊充风雅，已是常识。而碑文实作“大梁水”，“水”字漏抄，谬之千里。《辽史》卷 38《地理志》云：“东梁河自山西流，与浑河合为小口，会辽河入海。又名太子河，亦曰大梁水。”转作籍贯，则指辽阳。辽阳张氏乃渤海大姓，守愚或其后人。

再如“碣石”赵衍（中 2013），释曰：“今河北昌黎”。此说以为曹操东征乌桓赋诗《步出夏门行》之地，其实指西域碣石国，都城疏勒（今新疆喀什），后迁至伽师（今新疆伽师），当时属西辽，系一部分契丹人于亡国之际流落那里而建立的政权。赵衍先世碣石，后徙居北平，乃“辽勋臣”之后^②。

再如“安东”陈大任（中 2125），释曰：“今江苏涟水”。金时涟水设县，为山东东路益都府海州所辖。金亡后，归南宋。“景定初（1260 年），升安东州”^③。其时金亡近 30 年，因此，以涟水为安东，与实际不符。历史上，唐朝尝于辽东设“安东都护府”，以镇高丽，治所屡经变迁，遂为辽东泛称。入金后，则指东京辽阳。

再如“永安”张著（下 2681），释曰：“今河南永安”。《全辽金文》之姊妹篇《全辽金诗》又释为“今山西洪洞”，未知孰是。实际上，永安即大兴，指中都燕京。其《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跋》自署“燕山”，与之相通。大兴自辽名永安，入金后置卢龙军节度使，天德四年复改永安，贞元元年再更大兴^④。

地名屡经变易，以其与迁都有关，多见使用。金世宗尝谓宰臣曰：“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女直人寢忘旧风”^⑤。愚以为，从事古籍整理，与故纸堆打交道，也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如添些浪漫情调，或许不无益处。但是，大胆想象，应以小心求证为基础。否则，必然弄出笑话，贻误读者。

所收文篇水份过多

《全金文》所谓增收作者 102 人、文 948 篇，水份过多。这里有几种情况：

一是混入非金人文章。如郝希文《彻里葛二侯德政碑记》（中 1716），辑自《（同治）稷山县志》卷八，小传作“稷山人，举人”。今按，《（光绪）山西通志》卷 96《金石记》著录，题作《稷山县监县彻里铁木儿县尹葛裡德政碑》，云：“至正中，乡贡进士郝希文撰。”所谓“监县”，是元代官制的特有产物，由蒙古人出任，权力在县尹之上，以保障对汉人的统治。

再如孙大鼎《论迁都疏》（下 2726），辑自“《大金国志·宣宗皇帝》”，小传云：“贞祐间为中书舍人”。今按，金代官职无“中书舍人”。所谓孙大鼎，《金史》及有关文献难觅踪影。实际上，《大金国志》有关章节钞自南宋张师颜的《南迁录》。由于此人冒充女真君主御前辞臣，自称“握笔东观，道间被命，仍兼礼郎。驰驱清蹕间，粗知记注颠末”^⑥，涉嫌欺骗，自南宋迄清，代有学者质疑，揭露其伪书面目，至今已成共识。撰文者子虚乌有，其文何来？

再如赵秉文《黎立武学庸解序》（中 2386），辑自近人孙德谦《金源七家文集补遗》。今按，黎立武字以常，号寄翁，江西新喻人。南宋咸淳四年进士，仕为国子司业。入元后，隐于乡，有《中庸指归》等多种著述。元大德七年（1303 年）卒，年六十一，门人私谥元中子云^⑦。而赵秉文卒于金天兴元年（1232 年），其时黎氏尚未出生，如何为之作序？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 35《经部四书类》著录《中庸指归》等，云：“此书四本合编，前有大德八年赵秉政序。”由此可见，孙氏一时看走眼，将“赵秉政”当作“赵秉文”。而《全辽金文》毫无鉴别，

① 《（光绪）山西通志》卷 95《金石记》，中华书局，1990 年，第 6747 页。

② 元王恽《秋涧集》卷 43《西岩赵君文集序》，四部丛刊本。

③ 《宋史》卷 88《地理志》，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181 页。

④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64，中华书局，1988 年，第 2682 页。

⑤ 《金史》卷 7《世宗纪》，中华书局，1975 年，第 158 页。

⑥ 宋张师颜《南迁录序》，《南迁录》卷首，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6 年。

⑦ 元吴澄《吴文正集》卷 65《元中子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照钞照收。

二是收入专书中的篇什。其《凡例》称“只收单篇文章，不收专书”，实际却将《中州集》、《中州乐府》等250余篇小传辑入。这些“文章”在那些“专书”里，或与“诗”、“词”结合，成为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或围绕编纂宗旨，各自阐扬，相互联系。因此，不当作为“文章”收入。

三是收入文章标准过滥。如“无名氏”《谕河南关陕山东诸路榜》（下4032），辑自“《大金国志·义宗皇帝》”，全文如下：“罪无轻重，皆与蠲除。其有愿备行武为国驰驱者，当加旌异。”再如“无名氏”《二仙庙石门题记》（下4034），“据山西高平县岭坡村二仙庙正殿石门额首石刻抄件收”，全文如下：“城县莒山乡司徒村众社民户施门一合。正隆二年岁次丁丑仲伙（今按，当作“秋”字）二十日谨记。”如此等等，俱充作“一篇”。如这样的“文章”标准成立，则遗逸甚多。

四是重收问题未能杜绝。如赵秉文《详问书》（中2206）、《答夏国告和书》（中2207），亦见于金宣宗名下（中2396），不知是疏忽，抑或另有遵循？再如《戒谕百官诏》（下2746），归李献能名下，纠正了《金文最》“失名”之误，成为《全辽金文》的重要发现之一。令人遗憾的是，又在“无名氏”项下（下3887）收入。再如《重修晋国赵王庙记》（下4045），先是据“嘉庆六年《潜县志·金石录》卷上”收，归“无名氏”；继之以《重修赵王庙记》（下4072）为题再收，辑自《潜县金石录》。其实，“嘉庆六年《潜县志·金石录》”与《潜县金石录》为一书，后者不过将前者《金石录》抽出，独立刊行而已。《全辽金文》的“金文”来源，一是《金文最》，其中部分篇章漏辑，如沈英《栖闲居士张中伟墓表》、蒲察孟里《染庄社记》等等；二是“山西碑石钞件”；三是部分方志。编者注重搜集三晋碑石资料，无可厚非。然而，辽、金两朝之文非“山西”文献集成，如《常山贞石志》、《定襄金石考》、《陶斋金石记》、《益都金石记》、《陇右金石志》、《陕西金石志》、《满洲金石志》，及建国以来各地金代碑石考古发现等等，俱未征引。即使“山西”的碑石与方志文献，如《山右石刻丛编》、《（成化）山西通志》、《（雍正）山西通志》等，亦未检索，或检索不悉心，遗佚不少。

至于稀见秘籍，更是无从谈起。如医籍韵书、释典道藏等等，屡见散落的金人文章。以心无所系，那些埋藏已久的珍品很难发掘出来。凡此种说明，

《全辽金文》的发现过于浅薄，与当今社会信息化的发展状况不相称。粗略计算，仅从上述例举中即可辑得数百篇。这样的数目对于唐宋或明清总集来说，也许不算什么，而对于“金文”，以其传世甚罕，就是严重的问题了。

校订工作远未尽善

编纂一代文章，以涉及复杂，偶有疏失，似所难免。问题是，由于研究不够、积累不足，一遇生僻即止步不前，稍有说法则谬误绵连。现举数例以资说明。

一是全书从作者、篇目到字句，除罗列不同版本的差异，几无校订。如贾天羽《武乡县禅隐山崇圣寺十方禅会记》（中1888），署“大定二十七年月日记，显武将军沁州军资兼军器库都监骑都尉清河县开国男食邑口口口贾天羽撰并书，登仕郎沁州武乡县主簿权县事贾天羽立石”。一人同时冠以两种官衔，且与兼职、勋爵有别，或此或彼，必有钞误。再如“王反成”《大金故赠儒林郎郑公墓之碑》（中1728），录自《（光绪）定兴县志》，署“明昌三年四月五日，紫水散人王反成撰”。古人取名，颇有讲究。名“反成”，不惟罕见，也与名德之美意相悖。经检阅方志，“反”当作“友”字，系刻版不平、着墨不均所致。

再如“延安学”《二苏坟诗跋》（下3769），清吴式芬《捃古录》卷16著录，云：“武虚谷考为贞祐间刻，后有史学、屈子元二跋。”所谓延安学，即延安史学。“延安”后之“史”字，或泐或漏钞，遂将乡贯误作姓氏。金元好问《中州集》卷7收史学诗，小传云：“史学，字学优，延安人。”

再如“范恡”《归山操跋》（中1813），钞自《（民国）牟平县志》，署“大定甲辰中元日，州学正范恡跋”。今按，县志传录舛误，当是范明叔作，字寿卿，宁海人，范恡之侄，全真二代宗师丹阳马钰与之交谊甚笃。丹阳《归山操引》云：“钰与云水僧竺律师、殿试范寿卿，相会于郡城之北三教堂，因焚香宴坐，命酈州道士王大师鼓琴久之，亦一时之盛会。”寿卿预会，因题其后。《（光绪）登州府志》卷65录此跋，即归“范寿卿”，颇是。

再如“皇甫希永”《佛塔山重建高僧祠堂碑》（中2035），录自《金文最》。今按，石刻拓片作“皇希永”撰^①。此人乃费县玉虚观道士，尝为《玉虚观

^① 《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

松柏林记》书丹篆额，见于《（光绪）费县志》卷14，称“字体圆劲，有颜柳法”云。则道士姓“皇”，非“皇甫”。

再如“张文”《汉贾将军墓碑》（中2129），录自《金文最》。今按，碑原立于南阳宝丰县城西隅，清武亿《宝丰金石志》录文，作“进士张文纪纪实、里人陈邦彦书丹”。清吴式芬《捃古录》卷16亦著录，如之，时在大安元年八月。

二是文章标注的年代颇多谬误。如王蔚《祭浑忠武王记》（中1158），注为“天会七年”。而记文原署“阜昌七年正月初四日”。天会八年，女真册立刘豫为大齐皇帝；天会九年，齐以阜昌命为年号（1131）。至于阜昌七年，相当于天会十五年。所谓七年，是将“天会”与“阜昌”简单地等同了。

再如张曦《潞州长子县增修漳源熨斗台神殿之碑》（中1401），注为“明昌元年”，碑文有云：“天德壬申岁，涉夏不雨，邑人众议请泉神水祷雨”。天德壬申，即天德四年。明言“天德”，何来“明昌”？明昌虽有壬申，而碑文与之无涉，则是无端下推一甲子。此外，张曦还撰有《潞州长子县重修圣王庙记》（中1397），自称紫云居士，署天德三年，乃海陵时人。

再如范圆曦《太古集序》（中1669），自署“岁次丙申长至日”撰，注为“大定十六年”。今按，范圆曦，金末元初全真道士，己酉岁（蒙古定宗海迷失后摄政元年、1249）卒，年七十二。元初名士宋子真《普照真人玄通子范公墓志铭》（下2828）记之甚详。丙申，蒙古太宗八年（1236）。

再如邳邦用《唐太宗赐孙真人颂跋》（中1997），署“乙卯岁四月”，注为“明昌六年”。今按，金孔叔利《改建题名碑》（下3699）著录：邳邦用，安定人，正大元年词赋进士。释褐京兆府学教授。金亡后，仕为陕西行省郎中。由此，所谓乙卯，指蒙古宪宗五年（1255）。

再如蔡珪《谕孟宗献诏》（下3852），注为“明昌元年”。今按，金世宗夺帝位后，于大定三年开科取士，孟宗献连夺四元，成为当朝得人好兆头，因有诏谕，以资勉励。诏颁于世宗大定三年，而非章宗明昌元年。这些撰文年代涉及文章内容、作者生平及相关历史事件、典章制度等等，不那么简单，应略加考证，谨慎处理。

三是与这些该校而未校的问题相比，一些经过

校订之处反而复杂了。如李俊民《新建五祖堂记》（下2614），署“岁次乙卯十二月十二日记”，校曰：“乙卯为明昌六年，其明年改元承安矣。‘昆崙’当是‘昆仑’之误。”今按，乙卯，应是蒙古宪宗五年（1255年）；五祖者，指全真之王嘉及马钰、刘处玄、谭处端、丘处机等，其时均已离开人世，因建堂祀以香火；至于“昆崙”，昆当作“崑”，“崙”字不误，齐鲁之山名，全真之圣地，与“昆仑”无涉。与此相关的是，所注文献出处极不规范，甚至自行编造。如李俊民《重修庙学记》（下2605），注为“据光绪十八年本《山西通志·艺文》收”。实际上，《（光绪）山西通志》设“经籍”，无“艺文”。《（成化）山西通志》、《（雍正）山西通志》均辑入诗文作品，惟光绪志不收，所据何来？

再如李俊民《重修梁甫庙记》（下2611），注为“据光绪十八年本《山西通志·金石记》收”。光绪通志《金石记》为金石目录，不收碑文。这篇碑记实钞自李修生主编的《全元文》。如能客观说明，对他人劳动成果给予尊重，当不会降低自身价值。

再如陈时可《燕京白云观处顺堂会葬记》（下3707），注为“据中华书局影印本《正统藏》之《甘水仙源录》卷九收”。《甘水仙源录》为元代全真道士李道谦编，明正统《道藏》收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等三家联合影印，未闻中华书局参与。这些问题看似琐碎，却关乎古籍整理的质量，不能仅凭想象处置。否则，与作伪有什么区别？

四是一些碑文泐字未见订补。如黄久约《朝散大夫镇西节度副使张公神道碑》（中1362）：“公口口口，商老其字也”。其子暉及孙行简、行信，皆金代名臣。《中州集》卷9《张左丞行中》作“莘”；金赵秉文《滏水集》卷10《前御史大夫张暉赠父莘卿诔》作“莘卿”；《（嘉靖）山东通志》卷32小传作“莘卿”。比勘三部文献所记，可断《中州集》佚“卿”字，《滏水集》误作“莘”，当以嘉靖志为是，“公”后应补“讳莘卿”。

再如韩时举《济渎灵应碑》（下3692），文中有云：“粤春王正月，遣资政大夫、中常侍、兼上林署提点宫籍监使内口口口口药局直长高佑”。如悉心阅读，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种竹老人《重修济渎庙碑》（下3693）亦涉此人：“资政大夫、中常侍、兼上林署提点宫籍监使内侍局令尚药局直长高佑”。由此可补所泐数字。

至于标点错误，也随处可见。如张廷玉《朝散

大夫前德州安德县令郭公碑铭并序》(中 2017),有云:“次口口口丰姿业口口以贞元三年登口,管承事郎,终口三部口。法璘二子:长,济道,(略)次即公也。”今按,郭氏家学以律科称,“法”前所泐当是“检”字,“检法”为金代职官之一,常与“三部”连用。至于“管”,应是“官”字,以音近钞误。因此,标点当作:“次口口口丰姿,业[律][科],以贞元三年登[第],官承事郎,终[于]三部[检]法。璘二子:长济道,(略)次即公也。”

再如赵琢《大唐功臣汾阳王庙记》(下 3584),录自《(民国)巩县志》,署名钞作“昭武大将军、行芝田县令兼管口常平仓、移刺文林郎、守虢州军判、天党赵琢撰”。小传因作“元光二年时任芝田县令”。今按,碑记署名者包括篆额、撰文、书丹,分作三行,甚为清晰。如第一行:“昭武大将军行芝田县令兼管口常平仓移刺”。移刺,契丹人姓氏,亦作耶律。其名及“篆额”等数字泐;第二行:“文林郎守虢州军判天党赵琢撰”。前人校书,或有昏昏欲睡时,随手钞误。今人整理古籍,有教授头衔,有项目资金,应该做得好些。实际上,标点非小事,只有弄清文意,才能准确断句,使读者读得懂。清顾炎武《日知录》有云:“句读之不通,而欲从事于九丘之书,真可谓千载笑端矣。”

余论

一部古籍整理之作的“凡例”,应是规范全书的准绳。如《金文最》凡例云:“西夏遗文止录其臣服于金时所作,余不滥及。高丽同此例”。因此,辑入张陟《大夏国葬舍利碣铭》、贺宗寿《密呪圆因往生集序》等夏人文章,与其规定吻合。《全辽金文》凡例对此颇有异议:

西夏、高丽二国之文,曾被某些前贤所编

有关总集收录,如缪荃孙《辽文存》、黄任恒《辽文补录》等收其系辽代年号者,张金吾《金文最》亦收其臣服金朝时的文章。然此二国当时虽对辽、金称藩,实为独立的王朝,况且高丽国今已不在我国版图之内。以今之历史观绳之,不当收此二国的作品。

显然,这样的认识高于清人的历史观。然而,此说之后又悉数收入那些夏人文章。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说归说、做归做”的问题,已扩散到全书各个部分,混乱不堪,谬误丛生。

《全辽金文》后记称,邀请了三十五位校内外教师和研究人員,利用业余时间分头点校,历时一年多,编就迄今最为完备的辽、金文章总集云。但是,这些颇以为自豪之处,却暴露出问题所在。因为,那样的声明写不出整理之艰辛与切身之感悟。给人印象深的,不过是编纂人员之众多,颇类一场会战;编纂速度之迅捷,如同一次突击。而这样的“会战”或“突击”,恰恰背离了学术研究“厚积薄发”的规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古籍整理呈现新的局面,一些大型断代诗文总集竞相问世。然而,由于编者的学术基础及社会责任感等因素参差不齐,编纂质量各不相同,甚至出现了伪劣之作,即不学无术,却以学术研究的名义,或粗制滥造,或钞袭剽窃,以达到不宜公开宣示的目的。其中,《全辽金文》从凡例规定到编纂实践,无一不反映出对古籍整理缺乏积极理解,令人感慨唏嘘。一百余年前,张金吾编就《金文最》,完成了他那一代学人的使命,为后世留下了一份难得的文化遗产。相比之下,今人推陈出新的任务更为艰巨,否则,何以站到前人的肩膀上?

The Revise on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Liao and Jin Texts

XUE Rui-zhao

(Literature Institute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erbin150080,China)

Abstract: We have revised som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Jin Texts of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Liao and Jin Texts at brief introduction writing ,addendums and collation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Revise;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Liao and Jin Texts; Studies on the Rearrangement of Ancient Books

(责任编辑:闫丽)